一九二〇年的那一场雪

□丁晓平

下雪了，越下越大。雪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下的。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空低垂，德胜门的箭楼好像更俊俏挺拔了。清晨，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颠簸着穿过门洞，木制车轮在与雪地“吱呀–咯吱–吱呀–咯吱”的旋律中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迹，像雪花写给大地的两行诗歌。

骡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车把上的是一位账房先生，看上去像个乡佬，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另一位坐在车里，头戴毡帽，穿着一件厨师的背心，油渍满衣，油光发亮，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这大清早的，两位冒着大雪干啥呢？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看样子他们是趁着年根儿到城外收账呢。出了德胜门，骡车折向东南，跑得更快了。

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坐在骡车上的两个人，都是五四运动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车把上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坐在车里面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两个人都出生在金桂飘香的10月，年龄却相差整整10岁，相识相知已有6个年头了。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35岁的陈独秀第四次东渡日本，应老朋友章士钊之约到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25岁的李大钊，正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两人在《甲寅》杂志社见面后，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价值观，惺惺相惜。1915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邀约李大钊撰稿。1916年夏天，李大钊从东京寄来了长篇散文《青春》，纵笔放歌，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制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满腔热情地向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出崭新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陈独秀被这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所深深打动，决定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一号发表，由衷地感叹道：“守常真是文如其人啊！”

歌剧《红船》中展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场景

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三顾茅庐”，把没有大学文凭的陈独秀从上海请了过来，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进京，震惊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始。”半年前，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国，在北京主编《晨钟报》。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不久，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红楼，李大钊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很快结成同盟。陈独秀索性把自己独立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大家轮流编辑。“日夜梦想革新大业”的他“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发出了向封建文学总攻的号令，誓言“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918年11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李大钊在《新青年》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遭到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的反对。怎么办？陈独秀和李大钊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俩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红楼开会，决定创办《每周评论》。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就这样，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先驱者“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国家种下了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独秀和李大钊亲自到事件发生的现场，看望被捕学生，掌握第一手材料，天天都忙碌着采访、写作，点革命之火。《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6月11日，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的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践行了他“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的名言。一时间，舆论哗然，在全国掀起了营救声援行动。9月16日，陈独秀获保释出狱，李大钊赋诗赞曰：“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它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狱后的陈独秀支持李大钊推出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李大钊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定地站在一起，坚持走俄国人的道路，坚持以俄为师，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报告大会工作方针时说起了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刚刚出狱的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没有逃过北洋政府的监视。1920年2月2日，他应邀悄悄离京前往武汉演讲，“卓识谠论”深受青年学子欢迎。谁知，他在武汉的言行被媒体曝光后，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决定再次逮捕他，派警察在其箭杆胡同9号（今20号）的住处蹲守。李大钊等人闻讯后，在2月10日早晨悄悄从北京火车站把陈独秀接走，隐藏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第二天又转移到刘文典家，第三天再送到李大钊家中。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去天津乘船到上海躲避。2月13日晚，李大钊从王星拱家借来厨师的衣装，给陈独秀乔装打扮一番。5天后，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农历除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改变历史的瞬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定格在1920年2月14日的那一场大雪之中。天地白茫茫一片，只见这辆破旧的骡车如一头孤独的雪豹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奔跑，从历史的深处奔来，又向未来奔去，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空间……

马兰芳华

——罗布泊采访纪事

□徐　鲁

1 没有到过罗布泊的人，也许想象不到，在这荒凉、贫瘠、风沙肆虐的戈壁大漠上，竟然生长着一种生命力特别顽强、又异常美丽的野花，名叫马兰花。马兰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兰科，小花盛开时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春夏时节，在泥土湿润的孔雀河畔，在春水流淌过的荒野上和沟渠边，到处能看到马兰花蓝莹莹的姿容。

当年，前来罗布泊为核试验场选址的首任基地司令张蕴钰将军，正是因为一眼就看到了盛开在孔雀河畔的马兰花，在用无线电向党中央报告选址位置时，他脱口说出了“马兰”二字。从此，马兰这个名字就与共和国的核试验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成为奋战在罗布泊的英雄儿女们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和忠贞无私的精神象征。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夕，1964年6月的一天，马兰核试验基地的一位首长，告诉了年轻的林俊德一个喜讯：基地研究所党组织正式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祝贺你，亲爱的同志……

在听到喜讯的那一刻，林俊德激动得热泪盈眶，双唇颤动着，却不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光荣啊，俊德同志！”首长轻轻拍了拍林俊德的肩头，目光里含着赞许和期待。

1955年7月，17岁的林俊德从福建永春县贫困山区考上了浙江大学机械系。不过，因为家境贫寒，他差点失去念大学的机会。是家乡的党组织和乡政府、乡亲们，帮他凑够了从永春到杭州的路费。按照录取通知要求，早就过了新生报到的日期，机械系迟迟没有见到林俊德的踪影。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说：也许不会来了吧？系主任拿过花名册看了看，说：“这名学生家在闽南山区，离杭州路途遥远，再等等吧，一个山村少年能考上浙大，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位系主任猜得没错，林俊德在来浙大的路上，的确误了一些路程。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节省下一点路费，所以有好几段汽车路，他舍不得买票坐车，硬是徒步赶到了火车站。当他好不容易找到浙大校园时，机械系已开课两三天了。这个又黑又瘦的山区少年，穿着一身打补丁的衣裳，挑着简易的铺盖担子，赤着双脚走进了校园。

2011年秋天，林俊德70多岁的时候，回家乡参加母校永春一中校庆时，对师生们说道：“我是山沟里穷苦人家出身，如果当时没有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我根本上不了中学，也上不了大学，更不可能成为科学家、成为将军和院士。是共产党和新中国，让我‘绝处逢生’。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党和祖国母亲的寸草春晖般的报答。”

1960年，林俊德从浙大毕业时，被党和国家挑选出来，穿上了军装，踏上西行的列车。就像突然间从亲人和朋友面前“失踪”了一样，从此，他与无数年轻的大学生、科技人员、科学家和解放军将士一道，恪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保密纪律，隐姓埋名，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罗布泊荒原。

从1963年起，林俊德作为核爆炸冲击波机测压力自记仪研制小组组长，不仅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试验任务，也是少数几位参与和见证了我国全部的45次核试验的科学家之一。

罗布泊晴朗的夏夜里，满天的星星像晶莹的宝石，显得格外璀璨，仿佛伸手即可摘下。这天夜晚，在基地研究所简陋的小会议室里，两盏小小的电石灯被调到了最亮的亮度，灯光照耀着会议室小小的空间。林俊德和另外4名新党员，由一位张政委带领着，面对挂在墙上的一面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拳，一句一句坚定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国际歌》的雄壮旋律从小会议室里传出，久久回响在茫茫的荒原和高远的夜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当时，林俊德和他年轻的同事们，包括他的恋人与战友、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核试验基地的黄建琴，都对马克思这段青年时代的誓语耳熟能详，并以此互相鼓励。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和热忱，是一颗赤诚和炽热的初心，支撑和鼓舞着林俊德、黄建琴与战友们一起，把美丽的青春芳华和宝贵的壮年时光，无怨无悔地挥洒在茫茫的荒原深处。

在黄沙漫漫的戈壁滩上，在风雪交加的严寒的日子里，他们睡过地窝子和简易帐篷，喝过孔雀河最苦的碱水；在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里，基地的粮食供给不足，他们甚至也吃过榆树沟里的榆树叶和榆树皮。为了采集试验数据，林俊德和战友们也曾多次攀登到滴水成冰的天山冰大坂和雪峰上……

“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这是每一位进入罗布泊的英雄儿女的青春芳华的真实写照。以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力量，铸成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核盾”，实现新中国国防科技的强国梦想，不负党、国家和人民交给的神圣使命，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最坚定的信念！

2 几年前，我有幸得到一个机会，经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有关部门邀请和获准，与熊召政、刘燕燕等几位作家、艺术家一起，进入罗布泊腹地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和当年的核试验现场采访和体验生活。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次采访活动，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精神洗礼之旅。我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天狼星下》《罗布泊的孩子》，都是献给马兰的英雄儿女们的。

除了林俊德和他的战友当年放飞试验气球的天山雪峰我们没有登过，林俊德其他足迹所至之处，我们都寻访了一遍，包括爆破试验的大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核试验研究所曾经驻扎的红山山谷营房、林俊德一家住过的房子，林俊德做试验的房间等。在某部工兵团的院子里，保留着几个他们初到罗布泊时睡过的“地窝子”，我也特意“睡”进去亲身体验了一下；孔雀河和肖尔布拉克苦涩的碱水，还有博斯腾湖清清的“甜水”，我们也亲口尝过。

罗布泊腹地有一片狭长和开阔的谷地，仿佛是大自然特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一片“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蜿蜒迤逦的天山和大漠的皱褶里，不为人知。随着核试验的步步推进，从1966年开始，试验基地研究所的所有机构，陆续告别临时搭建的帐篷区和“地窝子”，迁入了位于天山南麓的这片隐蔽的山谷之中。

红山营房外，西北角靠近山脚处，几株白杨掩映着一排干打垒的平房，房子不远处有一条靠山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小河。一些平房门前的院子，四周用红柳枝条围成矮矮的篱笆墙和小院门。

这里曾是科技人员和后勤人员的宿舍。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情景：黎明时分的山谷，火红的霞光映照着附近的山冈、小河、房屋和树木，一声声嘹亮的晨号声，在天空回响。谁也不知道，这片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正埋伏着“千军万马”，不久的一天，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从这里横空出世，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将震惊全世界！

我们去寻访的时候，山谷里的营房早已人去楼空。当地的几户维吾尔族兄弟偶尔会到这里来放放羊。春天里天气暖和了，溪流边的马兰花又将盛开；沙枣树和红柳丛也会恢复生机，长出新的蓬勃的枝叶；云雀会在孔雀河边的芦苇林上空，欢唱着飞入云霄；沙鸡之类的沙漠禽鸟，还会在戈壁上飞跑和追逐……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心地区，遍地都是灰黑色的、细碎的石头。不难想象，当时，该有多少巨大和坚固的岩石，以及一些用于试验的效应物，如飞机、汽车、坦克、房屋、大炮、钢梁等，都在巨大的爆炸中，瞬间变成碎石，化作齑粉。如今，一块巨大的褐红色花岗岩矗立在当年的爆心位置，仿佛一块永久而无言的纪念碑。花岗岩左边，还残存着半截深插在地下的、足有成年人体半径一样粗大的空心钢管，显然是当时支撑起那颗原子弹的脚手架的某个支点。

奇怪的是，在遍布细碎的石头和曾经烧焦的大地上，又长出了一丛丛顽强的芨芨草和骆驼刺。每一阵大漠风沙吹来，它们都会发出有如铜丝一般铮铮的鸣响，仿佛在诉说着英雄儿女们不朽的功绩。

中国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离不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那一代领袖集体的坚强领导与坚定决心，也倾注了奋战在罗布泊大漠深处的数万名马兰人的智慧和心血。有许多部队将士和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牺牲，不少人献出了年轻和宝贵的生命。

马兰基地创建后，在进场试验或施工爆破中不幸牺牲的战友，就临时掩埋在一片生长着几株高大的胡杨树的空地上。一年又一年，胡杨树下的新坟不断增多。今天，矗立在马兰基地的一座安息着数百名在核试验事业中英勇献身的马兰英雄的陵园——“中国核试验基地烈士陵园”，就是在当年那几株胡杨树下的墓址上落成的。这些共和国的英雄儿女，把青春的热血洒在了戈壁滩上，他们年轻的生命，像天山一样巍峨，也像大漠一样壮阔。

3 从位于红山山谷的生活区营房去往试验场区，要经过一条几公里长的狭长沟谷，因为沟底生长着很多粗壮的老榆树，马兰人把这里称作“榆树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年月里，这些老榆树上的“榆钱儿”和榆树皮，给马兰的英雄儿女们充过饥；老榆树粗壮的树干和巨伞般的树冠，也为英雄儿女们遮挡过雨雪和风寒。

我们在马兰采访的时候，特意去了趟榆树沟，为的是亲眼看一看一棵足有两人合抱粗的老榆树。在这里组织和指挥首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将军，给这棵榆树命名为“夫妻树”。马兰人没有不知道这棵夫妻树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棵老榆树见证过一对年轻的共产党员夫妻的“奇遇”。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前一年，即1963年，在北京某部研究所工作的王汝芝副所长，奉命调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参与首次核试验任务。对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使命。王汝芝兴奋得连夜开始收拾行装。

凡是被挑选出来进入基地的人，都必须执行最严格的保密纪律，必须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临行前，王汝芝编了个理由，对丈夫张相麟说：“我去外地出一趟差。”

张相麟也在某研究所工作。听到妻子的话，他只是平静地说了句：“好啊，注意照顾好自己啊！”王汝芝又叮嘱了一句：“对了，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回来，记得写封信给我妈，报个平安，免得她惦念。”

一个月后，王汝芝穿着军装来到马兰基地。一进试验场她就明白，和丈夫压根儿也不再抱见面的希望了，连通一封报平安的信都不可能。所以在老家的母亲一直以为女儿被派到国外学习去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汝芝和几位女同事从试验场回来，刚走到榆树沟时，突然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她们只好跑到沟里的老榆树下躲雨。不一会儿，又有一些人扛着试验器材跑过来躲雨。突然，王汝芝看见，有一个穿着军装的身影怎么那么眼熟？那个人低着头，提着器械箱，撩起衣服遮挡着雨点，三两步跑到了老榆树下。

王汝芝好奇地走上前去，扳过那人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惊喜地叫道：“相麟，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张相麟也像在做梦一样，眨巴着眼睛说：“汝芝，你……你不是出差去了吗？”两个人愣愣地看着对方，先是惊喜，继而又会心地相视而笑。

不久，张爱萍副总参谋长来到基地检查工作，听说了这对夫妻的故事，就特意绕道经过榆树沟，看了看这棵老榆树。一对战友夫妻在互不知情的状况下竟然在榆树下巧遇，这位诗人将军不由得感慨道：好啊！这不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吗？略一思忖，他当即给这棵老榆树起名为“夫妻树”。默默无语的老榆树，见证了一对共产党员夫妻对党的纪律、党的事业的坚守与忠诚。

当年，首批进入马兰试验基地的有40多位女同志，分住在5顶临时帐篷里，张爱萍将军也曾为女同志们住的帐篷区取名“木兰村”。黄建琴当时就在王汝芝任主任的研究所一室工作。这些女同志，也被后来的马兰人尊称为“核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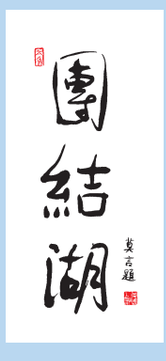
我在西安采访“核大姐”黄建琴时，她回忆说：当时她与林俊德恋爱两年，虽然都在同一个研究所，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的时间还不到一整天。不是他进场，就是她进场，互相之间也从不过问去哪里、去干什么，这在试验场区是大家心照不宣、再平常不过的。那棵夫妻树，见证了我们那代人的爱情，更见证了我们对党的忠贞、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再会编故事的小说家，也虚构不出夫妻树这样的现实故事。”我问黄老师，“你们这些‘核大姐’，没有一位想写小说的吗？多好的故事素材啊！”黄老师笑着说：“不能写！那时候每个人都明白，既然我们选择了这项事业，就要一辈子隐姓埋名。像汝芝大姐这样的夫妻故事，也只有我们马兰人自己来分享了。”

4 沙漠上的春天总是来得很晚。当严酷的冬季还没走远，人们苦苦盼望的春天还没有抵达冰封的孔雀河两岸，马兰花坚强的根须，在泥土之下默默存活和忍耐着，感知和谛听着沙漠之上春天的脚步。虽然春天的脚步时常会受到暴风雪的阻隔，但春天的脚步终究是任何风沙和风雪无法阻挡的。随着残冬的步步退却，蜿蜒的孔雀河畔，辽阔的博斯腾湖边，坚冰开裂，残雪融化，马兰花在所有植物中最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绿意，向人们预报着春天的到来。

马兰花、胡杨树、芨芨草和骆驼刺的顽强的生命，多像那些牺牲在罗布泊的英雄儿女们的英魂！他们的骸骨和英魂，都已化作了马兰花、胡杨树、芨芨草和骆驼刺的枝枝叶叶，每年春天都会捧出一片新绿，装点着祖国壮丽的山河，也装点着这片铭刻着一代代英雄儿女的奋斗记忆的大漠。

2012年5月31日，已是生命垂危、身上和口鼻处插满了各种管子的林俊德院士，在女儿的扶持下坐在电脑前，为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使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埋在马兰……”

凡是在罗布泊马兰基地奋斗过的人，几乎都留下过这样的遗嘱，希望自己能“魂归马兰”，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永远在一起。2014年，林俊德的骨灰也安葬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里。陵园里巍峨的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

夜渡黄河（油画）　艾中信　作